

1943年国共围绕《中国之命运》的论争

国共论争是国共斗争的重要方式和表现形式之一。1943年3月,国民党通过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国共产党发起无耻的政治宣传攻势,并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两党论争的大幕由此拉开。

解决中国命运问题的关键

1943年1月,国民政府分别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虽然范围仅限于英、美两国,但实际上宣告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而言,这无疑是值得宣扬的成绩。

1月14日,《中央日报》发表题为《这是谁的成功》的社论,直接将这一成绩归功于蒋介石。两天后,该报又发文称颂蒋介石,将其与孙中山比肩:“天不赐给我们先知先觉的国父与英明伟大的总裁,谁来领导我们奋斗?”

国民党的理论家、在《中央日报》任职的陶希圣借此宣称国民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唯一性。《中央日报》对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成果进行了政治化阐释,对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角度,论证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正确性”和“唯一性”。

3月,由陶希圣等人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问世。该书认为“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完整表述了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大篇幅阐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价值和意义,将其与辛亥革命一起作为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强调“一个党”“一个主义”理论,提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

书中还引用明朝“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与清朝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的历史,将中国共产党与李自成、张献忠类比,影射中国共产党是造成中国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书中还宣称“中国之命运”的关键问题在于“军令、政令不统一”,而不统一根源在于有共产党这一“新式军阀”和其领导的“新式武装割据”;解决中国命运问题的关键,是在“两年内解决共产党问题”。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第三次攻击的思想舆论信号。5月15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趁机发动宣传攻势,大肆叫嚣“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要求中共“解

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中共初期应对策略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中国共产党基于内部整风运动等多方面考虑,并未作出强烈反应。直到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复函凯丰:“《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这事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警觉,而“考虑办法”则表明中共尚未作出决定。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政治、舆论攻势,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击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随即把对《中国之命运》批判提上议程。7月13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要痛驳。

7月21日,陈伯达撰写的《评〈中国之命运〉》发表,这是中共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反驳文章。陈伯达指出:“蒋先生在此公开反对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苏俄的共产主义思想……蒋先生此书一出,难道不怕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汪精卫辈引为同调,而使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觉得可惜,觉得齿冷,觉得丧气吗?”他把蒋介石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变为反对美、英、苏,巧妙地将蒋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配合这篇文章,中共展开了一系列活动。毛泽东回电董必武,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将陈伯达的文章“设法秘密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在渝报馆中,以此文作为课本,进行解释讨论”。这是中共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而采取的举措。

8月11日,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南方局:“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九月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要求《新华日报》和《群众》“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9月15日,《新华日报》发

表社论《民主第一》,提出“民主第一”的口号,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借“抗战外衣”行独裁之实,搞所谓的“军令、政令统一”。

毛泽东驳斥国民党

《中国之命运》的核心,可归结为这样一段结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地)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简而言之,就是所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中国的政治前途在于国民党”。

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反对。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观点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强烈不满,一大批学者纷纷发文驳斥。范文澜在《谁革命? 革谁的命?》中说:“现在的中国,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在非沦陷区,除几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外,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文章从现实状况出发,指出国民政府取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有限。

此外,艾思奇著《〈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吕振羽著《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齐燕铭著《驳蒋介石的文化观》,这一系列文章与《中国之命运》针锋相对,从多角度进行驳斥。

8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直接跳出国民党设定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义”这一议题范畴,用更具时代价值的议题“抗战救国”进行反击,将两党抗战成绩作了比较:“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

敌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百分之五十八(35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百分之四十二(25万人)。共产党又抗击了全部伪军62万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56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百分之十。”文章用详尽具体的数据驳斥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系列反击,重点都指向“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但对中国的政治前途没有过多论述。陈伯达在驳蒋文章中,关于未来的论述仅有一句话:“让以民众为主人翁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诞生出来吧!”

此次论争,国共依旧保持着“斗而不破”的状态。国民党通过出版《中国之命运》,试图削弱中共政治影响力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化解和反击了国民党的“反共”舆论攻势,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摘自《红岩春秋》 龚燕杰/文)

附录

“宣传闪击”挫败酝酿中的“反共”高潮

1943年3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其中对共产党极尽诬蔑之能事,暗示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此发起宣传反击。8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这两份文件用事实和数据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坚持抗战的主力。

毛泽东以“宣传闪击”的方式博得了国内外的舆论声援,抵消了《中国之命运》的负面影响。英、美、苏三国也向蒋介石施压,加之延安军民的严阵以待,蒋介石被迫改变“反共”计划,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蒋介石还电告朱德总司令,声明无意进攻边区,其酝酿中的“反共”高潮还未形成,便被挫败了。(摘自《党史博采》 张家康/文)

东莞舰、安庆舰首次海训,中国“万吨大驱”“从一到十”

近日,中国海军的两个数字(舷号),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109”和“110”。

这两个看似普通的舷号,其实是国产055型万吨大驱第9艘东莞舰和第10艘安庆舰的编号——这标志着中国海军在短短6年内,从南昌舰入列算起,集齐了10艘万吨大驱。不久前,这两艘万吨大驱首次出海训练的画面公开,万吨巨舰劈波斩浪的场景令人震撼。这种从一到十的飞跃,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整体跃升。以前是“你有我也有”,现在是“你的我不但有,还比你多,还比你强”。

随着109东莞舰、110安庆舰的入列,055家族不仅完

成了从个位数到两位数的跨越,更重要的是,已经实现了在三大舰队的全部列装——这意味着这种被公认为“全球战力最强”的驱逐舰,已经成为中国海军的标配和常态。

这次公开的时机,也非常耐人寻味。就在不久前,某些西方国家还在搞所谓的“兵棋推演”,甚至有些军工企业为了卖货,制作了各种“击沉中国军舰”的动画视频。结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只轻蔑回了一句:“You wish(想得美).”而现在,随着109、110的画面公开,这句话的豪迈底气在哪里已不言而喻。

事实上,西方的那些CG动画,渲染得再逼真,也只是显卡的功劳,而中国这两艘万

吨大驱劈开的浪花,却是实打实的钢铁洪流。这种落差,让某些人心中很不是滋味。

军事评论员宋忠平说过一个细节:一艘航母通常要搭配两艘055型驱逐舰,才能构成完整的作战编组。现在中国已有三艘航母,福建舰即将形成战斗力,上述10艘万吨大驱就像是给航母配齐了最强“带刀侍卫”。以前讲“近海防御”,现在则是“远洋护卫”。

这次海训,东莞舰和安庆舰达到了预期效果。这背后可能是复杂的体系作战演练,是对海、对空、对潜的全面考验——东莞舰和安庆舰不是去秀肌肉的,而是去习惯那片深蓝的。

西方总爱炒作“中国威胁论”,研究中国的每一艘新舰,



但他们可能永远搞不懂一件事:中国人集齐10艘万吨大驱,不是为了去别人家门口耀武扬威,而是为了在有人想来我们家门口闹事时,有足够的力量站出来,底气十足地说一句:“You wish.”

当“109”和“110”的桅杆划破海平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艘军舰,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决心。从一到十,是数量的积累,更是质的飞跃。未来的深蓝舞台上,这样的“王炸”,中国还会隔三岔五地出。(综合央视网、环球网)

军事智能时代,AI与人如何协同作战

去年以来,为加快整合人工智能(AI)技术,提升作战能力,获取战略优势,美陆军推出“新半人马”模型,旨在通过分层设计人机协同关系,确保人在战场上的指挥决策权。这一模型迅速引发关注。

在AI领域,“半人马”模型出现较早,在国际象棋、医疗诊断和金融分析等领域的使用较为普遍,证明了人类直觉与AI协作,能够超越任何一方独立工作的表现。

本世纪以来,当人机团队首次在国际象棋比赛中战胜人类选手后,“半人马”这一概念被特别用来描述象棋大师与象棋软件组队参赛的方式,凸显了人机协同优势。然而,当这一组合被引入军事领域,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远超棋盘上的输赢。

关键问题在于:随着AI逐渐走上战争“指挥席”,人类究竟是获得了更强的辅助决策能力,还是在“悄然间”让出军事决策权?

一旦算法参与到军事决策当中,造成的失误将由谁来承担?

美陆军因此推出“新半人马”模型,尝试重新定义人机关系。

这一模型提出一种分层级的人机协同体系,主张从“战术—战役—战略”三个战争层级设计人机关系,而不是盲目地将AI嵌入所有决策环节。

美陆军称,不同战争层级面临的责任风险不同,需要不同的人机协同模式。在战略层面,AI可以承担数据整合与趋势预测,但政策判断与战略决策必须由指挥官完成。在战役层面,需要保留明确的人工决策节点,确保关键假设与决断由指挥官确认。在战术层面,允许有限的“人在决策环外”的快速决策,同时优先强化战场信息支援,如态势融合与风险

预警。

这一设计背后,隐含着对人机协同失控风险的担忧。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人类在潜移默化中将判断权逐步“外包”给机器,从“人主导、机辅助”的“半人马”模式,滑向“机主导、人执行”的盲从状态。这种风险不会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往往始于看似无害的便利。例如模型能快速生成方案初稿,人类只需修改润色即可;算法能迅速筛选作战方案,人类只需判断风险与可行性。久而久之,人类将习惯于在机器生成的框架内思考,不再擅长从零开始独立推演。这种对机器的依赖,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动化偏置”倾向,即当机器表现稳定、专业时,即便生成的内容缺乏充分验证,人们也更倾向于信任它——在军事筹划这类高风险环境中,这种倾向极具危险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前部分兵棋推演实验显示,生成式AI模型的输出存在迎合倾向。面对不同提问方式时,AI模型会调整立场甚至迎合提问者。这表明AI模型并非真正具备独立判断能力,其输出高度依赖输入信息与人机交互方式。若将其直接置于决策核心,风险不言而喻。

基于此,“新半人马”模型的核心目标,不是更快生成作战方案,而是更快识别“坏方案”,并在复杂决策环境中保持清晰的责任链条。如果体系的设计能够确保AI模型只提供速度与算力优势,不触碰最终决策权,AI将极大提升指挥决策质量;反之,若人机责任边界模糊,效率越高,隐藏风险反而越大。在军事智能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如何守住决策责任底线,值得深入思考。(摘自《中国国防报》)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3月11日披露,驻韩美军近期把部分部署在韩国庆尚北道星州基地的“萨德”系统拦截导弹,转移至位于京畿道平泽市的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准备随时将其转移至中东地区。

同一天,韩国SBS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其获取的一段监控视频为依据称,部署在星州基地的“萨德”系统发射车3月初被运离星州基地,运往中东地区,且经识别有6台发射车。韩国媒体推测,由于星州基地部署的一个“萨德”作战单元正好由6台发射车组成,这意味着该系统发射装置或已从基地全部搬出。

美军挪走“萨德”系统,再次引发韩国社会对“自主国防”的讨论。韩国舆论认为,这件事表明,驻韩美军能根据美国自身战略需求随时调动在韩装备,韩国需要加快推进“自主国防”进程,不能完全依赖外部力量。

李在明3月10日说,即便在韩同盟框架下,韩国也必须具备自主防卫的能力。美国此前声称

“萨德”系统是“半岛防御所必需”,却可以在没有事先充分通报韩方的情况下将其调离,再次引发韩国舆论对其部署正当性的质疑。

星州民间团体3月10日在一份声明中质问,如果“萨德”真如当初美方所宣称的那样,是“防御朝鲜导弹威胁所必需”,为何在半岛形势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相关装备可以被迅速调往其他地区?

“威胁主权与和平的‘萨德’系统,已不再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韩国国土上。”上述声明还要求,立即撤出雷达等所有“萨德”相关设备,同时彻底撤除部署在韩的“萨德”系统基地。

与此同时,星州民间团体和一些韩国媒体认为,在韩部署“萨德”不仅加剧地区紧张,还给韩国带来安全风险和政治压力。

另外,韩美3月9日正式启动的代号为“自由之盾”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也在韩国持续引发争议。有韩国专家和民间团体担忧,韩国恐卷入美国的战争行为。(据新华社新媒体)